

研究论文
Articles

论“华语”与 马来西亚华语研究*

On Mandarin and Malaysian Mandarin Studies

邱克威
(KHOO Kiak Uei)

摘要

“华语”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共同语，作为一种区域华语，是全球华人共同语的一个变体；它与大陆普通话、台湾国语等都是一个“大华语”家庭的成员。因此对于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除了共时层面的比较异同，还应该追溯历时脉络探索其形成过程。本文从“华语”一词在马来西亚使用的历史及其含义入手，确立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基本定位；然后由此出发通过现实语料的搜集以及历史文献的爬梳，将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领域与范围在共时与历时两个轴线上铺展开来，并结合材料分析揭示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发展方向。我们主张马来西亚华语研究应该置入整个汉语语言学研究的界域中进行审视：在共时层面上探讨汉语共同语地域变异的多样性、在历时层面上探讨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多面向复杂性。

关键词：华语、马来西亚华语、现代汉语形成、共时与历时

* 本文初稿为马来西亚大学 2012 年华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3 年经过修订增补。

邱克威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E-mail: khoo@fbmk.upm.edu.my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12

Abstract

Mandarin is the common language for Malaysian Chinese. As a regional Mandarin, it is a variant of the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which also constitutes a member of the *Greater Mandarin* that includes Putonghua of Mainland China, Taiwan's Guoyu and such. Therefore, the study of Malaysian Mandarin should also encompass, besides a synchronic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Mandarins, a diachronic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its formation. This paper begins by examining the usage of the term Huayu (means Mandarin) in Malaysia context, thereby deriving an appropriate positioning of Malaysian Mandarin study, whence following an analysis of relevant materials, manifests the full amplitude of Malaysian Mandarin study within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scope of linguistic study, and concludes a directional opin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laysian Mandarin stud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research on Malaysia Mandarin needs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broader scope of Chinese linguistic study, both illustrating the diversities of different regional Mandarins on the synchronic scope, and the manifold developments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Mandarin on the diachronic scope.

Keywords: Mandarin, Malaysia Mandarin, Formation of Modern Mandarin,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绪论

关于南洋华人称民族共同语为“华语”，乃至自称为“华人”，陈重瑜（1986）有过一番论述：“这些词只表达实际的存在，而不涉及认同或倾向。”这其实是回应此前卢绍昌（1982）、汪惠迪（1984）等人所倡议的：“创制‘华人、华语’是要跟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按照卢、汪的观点，马新华人是在国家独立后有意与中国“保持距离”而创制“华人、华语”。这种观点甚至影响了中国学者，郭熙（2004）也说：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自从独立后用“华语”代替“国语”，用“华文”代替“国文”。

实际上，马新华人以“华”自称是自来如此的。我们只要略翻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叻报》，“华人”、“华语”、“华文”、“华言”、“华字”、“华书”、“华绅”、“华店”、“华商”、“华差”、“华童”、

“华男”、“华妇”、“华工”等等就俯拾皆是。当时马新并未独立，无所谓“保持距离”。更何况《叻报》中“华疆”、“华海”、“在华”、“由华来叻”、“华来之人”等都直接以“华”指中国，似乎就更应该“避讳”了。当然这种以“华”自称也不尽如陈重瑜所说的“不涉及认同或倾向”。本文主张这其实是自古“华夷之辨”在南洋社会中的现代诠释，即以《叻报》为例，“华、洋”对举是个通例。

对“华语”一词的正确理解直接影响了华语研究的定位，因此有必要进行辨析。否则如马来西亚吴文芯（2005）提的“华语源于普通话”、“马来西亚的华语以汉语普通话马首是瞻”等等错误论述，最终将把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带入死路。

我们主张马来西亚华语是汉民族共同语中的一员；从共同语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华语与新加坡华语、台湾国语、大陆普通话等都属于同等的变体。这一点徐杰（2003）曾经提过。陆俭明（2005）也曾倡议“大华语”的概念：

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汉民族共同语。

其中“以普通话为基础”自然是针对大陆汉语研究而言，但这种带“弹性”与“宽容度”的视角，正是目前的动态规范所应提倡的。因此对于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我们同意陆俭明（1995）关于“新加坡华语的特点”的处理，即“语言学工作者的任务是去发现这些特点，描写这些特点。”本文正是由此出发，主张从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来探讨马来西亚华语的本质特征并进行描写，同时挖掘其语言学的意义。

共时层面的横向比较是目前较多关注的，然而不能只停留在差异的描写而不追溯形成差异的原因及其语言内外机制；这就必然将我们的视线投向历时层面的探讨。通过马来西亚华语早期语料的整理分析，我们可以将马来西亚华语的形成置入整个现代汉语发展史的脉络中考察，并结合马来西亚特殊的语言环境，深入揭示这一过程中的语言学意义，即：现代汉语形成中各种变异形式互动的动态复杂性，这属于语言内部机制；以及外部

机制的社会环境因素对语言变异的影响。

论“华语”

(一) “华”与“汉”的词义分工

关于“华语”一词的词源及其现代使用情况，张从兴（2003）、郭熙（2004、2007a、2007b）等都曾征引文献进行过详尽的论述。然而探讨南洋华人之以“华”自称，实在无必要将线索牵至先秦两汉。因此我们这里仅将视线置于18、19世纪以来的论述来考察“华”字的含义，以及同时段内“华”、“汉”等同指词汇的使用情况与区别。

首先从中国的情况来说，自18、19世纪几部朝鲜人编写的汉语学习教材名称及其内文论述中，我们就能看出“华”、“汉”二词有明显不同的含义，其各自分工是明确的。我们先看“华”字的情况：

1747年朴性源《华音正韵通释韵考》序“依华音初声以订我音”，
1751年洪启禧《三韵声汇》序“华音则《洪武正韵》字母为主”，
“华音”即官话音。

1880年代《华语类钞》与1883年李应宪《华音启蒙》序中之
“华语”，均指官话。

至于“汉语”的使用，如1776年李湛《汉清文鉴》一书的凡例中称“汉字释音皆以清字。”这里“清字”指的就是满洲文字，而全书之“汉音”、“清音”对举，就是指汉语语音与满洲语音。（转引自金基石，2003）

从以上用例分析，我们看到，18、19世纪“华语”、“汉语”二词的使用情况如下：华语和汉语都是指汉民族的语言，通常特指共同语；但二者又各有分工，即“华语”是与中国以外的语言对举的，而“汉语”则与“清语”（满洲话）对举。

我们在19世纪南洋华人语料中也发现跟上述朝鲜语料同样的情况：

1899年《叻报》“一有发辫者，为清人；一留全发者，为汉人”、

“竟成汉不汉、清不清。……意谓华不华、彝不彝。”

(陈省堂〈割辨通议〉)

这里与上述朝鲜文献中的“华”、“汉”分用情况完全一致。

南洋华人以“华”字来指称华人及其相关事项，已如上文所列《叻报》用例。我们还特别注意到，由于新马华人方言族群性特征，《叻报》本地新闻往往称“闽人”、“粤人”、“潮人”等，而其称“华人”则主要是两种情况：一为笼统指称整体华人；二为无法确认籍贯者。前者尤见于他族并举时，如《叻报》：

1899年1月4日〈西年补志〉“有华人、西人、穆拉油人、吉宁人”。

1904年2月8日〈勇而忘义〉“荷人九名、叻产华人十名”。

后者如：

1904年2月9日〈因肿脚死〉“不知名姓之华人”。

1906年2月22日〈移病酿案〉“不知姓名之华人”。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华”字是南洋华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总称呼，尤其与本地其他各民族对举时更直称“华人”。这也就是词汇学上“统言”、“析言”的分别，即华人群体内的析言为“闽人”、“粤人”等；而作为一个族群与他族对举的统言则称“华人”。这恰可与中国境内之民族情况做对比。由于中国当时的政局特点而形成“华”与“汉”的统言、析言格局，即相对境内之满族的析言为“汉”、对外国民族之统言为“华”。

至于近代以来“华”字之含义，如方维规（2012）指出的，中国近代对于西方人的称谓：

大约自1860年前后开始，“洋”字的使用开始慢慢取代“夷”字的使用。

这种变化代表了中国士人对于西方的认识，“从使用具有蔑视色彩的‘夷’，转向使用更加可观和中性的范畴”。相应的在《叻报》中我们看到的大量是“华、洋”对举。如1888《越南游记》“华洋杂处”、1893年《再论华人往墨》“华洋互市”、1894年《论中国船炮机器宜自行制造》“华工不若洋工之巧”，另还常见“华差、洋差”对称、“华人、洋人”对称。

我们将这种“华、洋”对举解释为自古“华夷之辨”的一种现代诠释，尤其在异域的南洋汉人面对洋巫等外族人时更是以“华”自称。因此我们翻遍《叻报》，“华”字头的词语比比皆是，而几乎不用“汉”字。即使是在民国建立以后，“国语”一词为官方钦定为汉族共同语的名称，“华语”、“华文”也仍是持续使用的。

当然，与现代“华语”或者“汉语”兼有广狭二义一样，18、19世纪的“华语”有时指包括方言在内的汉民族语言，有时则特指汉民族的共同语。比如陈省堂《称名宜正》：

阿爹阿妈为华人父母之称，安官安娘是闽俗双亲之号。

（载《星报》1893年10月17日）

这里的“华人之称”正是指狭义的汉族共同语。另外同是陈省堂《越南游记》：

幸旁有略识华语者，因恳译以南言，并给其值，取鱼而归。噫！音语不通，其支拙若此，可笑甚矣。然越妇之通晓闽粤潮琼各籍语言，亦不乏人。

（载《叻报》1888年5月8日）

这里显然说的“略识华语”即指“闽粤潮琼各籍语言”，而称“华语”正是指与“南言”对举的，即广义的汉族的语言。

于是我们主张，“华语”、“华人”等称谓在18、19世纪的时候已经是汉族人的自称，尤其与外国人及外国语言对举的时候，“华”字更是最

惯用的自指称谓。这里包含了自古“华夷之辨”的文化意识，因此不尽如陈重瑜（1986）所说的“不涉及认同或倾向”。当然，更不是如卢绍昌（1982）、汪惠迪（1984）等人所倡议的：“创制‘华人、华语’是要跟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民国建立之后“国语”曾经一度使用，但那也只是顺应民国政府的语文政策，尤其是语文教育政策的需要；而至于“汉语”则在南洋华人历史上从未曾作为通行称谓，更遑论说“侨民当时以‘华’代‘汉’主要是对新祖国、新身份认同的一种表现”。（吴文芯 2005）

（二）“华语”与华语规范化问题

汉族的语言自从近代“文字改革运动”以来就背负着民族振兴的重担。卢戛章（1892[1957]）《一目了然初阶》中的话就很典型地代表了这一思潮：

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
其所以能好学识理，基于切音为字。

因此，1949年以后语言统一就顺理成章地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宪法。而海外的华人，虽然隶属于不同政体，但是文字改革承载着民族振兴的观念仍是根深蒂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其他民族，汉语族群对于语言统一及标准化的要求表现得尤为迫切。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汉语全球化趋势必然带来的各区域华语之间的碰撞。而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强大，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担任起重要作用；其余且不论，单就邹嘉彦、游汝杰（2001）提出“语言综合竞争力”的五项要素来衡量，大陆普通话就必然占了最大优势。于是各地华语纷纷举起向普通话靠拢的“规范化”大旗。走在最前端的当属新加坡，从国家领导到学界代表、从媒体到教育，新加坡上下都极力主张“新加坡的华语尽量向普通话靠拢”。（周清海 2011；又见邱克威 2012b）

以上所论纯粹是外部因素来谈语言问题。但语言毕竟是一种社会形态

的表现，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系统的语言，我们绝对不能忽略其自身的生态；更何况语言承载的是一个社群生活的集体记忆，包含了语言使用者丰富的社会与生活信息。我们甚至可以说，语言是一个社群历史的沉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陆俭明与徐杰等人才会提出新加坡华语的规范化应以自身生态为标准，而“不一定要受到中国汉语规范化的限制”（陆俭明1995），即“新加坡华语的规范应该是以自身标准为依据的规范”（徐杰2003[2007]）。

这是从语言自身的生态而言的。即使是从语言规范的角度来看，所谓“以自身标准为依据的规范”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知道“语言规范”的最基本原则就是群众性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语言事实。脱离群众基础、枉顾语言事实，一味自说自话的“规范”注定是要失败的。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西汉末王莽的语言政策，以及文革期间制定的“第二批简化字方案”。也正因此，大陆教育部2002年公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就特别强调规范化的三大原则：一、通用性原则；二、理据性原则；三、系统性原则。而以“通用性”为最高原则。更值得注意的是，大陆词汇学家苏新春（2002）认为单是如此仍无法突出“群众性基础”的重要性。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三大原则，即“俗成性原则”、“实用性原则”、“指导性原则”。所谓“俗成性”，是指“根据语言使用的现状来进行规范。它强调语言的使用频度，强调遵从社会成员大多数的使用习惯。”而“实用性”就是“指异形词规范要根据现实语言的实际与需要，根据现实语言的动态变化来进行。”最后“指导性”则是指推行规范的强制性。可见苏新春认为规范的推行应完全以语言事实为依据，完全可以不考虑所谓“理据性”。

目前马来西亚华语规范化问题的弊端，最根本的就是没有认清“规范化”的实质，甚至可以说误解了“规范”与“规范化”的意义。这一点邱克威（2011a、2011b、2013e）曾重点进行批评与分析。再举例如杨欣儒（2010）以“规范”之名出版的新书中列表以“新马港台”与“规范词”对举，即拿着“普通话规范”的一把尺来衡量各地华语的词汇，这无异于说“新马港台”词汇是“不规范”的。但是词表中却又将马来西亚货币单位“令吉”列为“规范词”，而把普通话的“零吉特”列为不规范。这就

表现出其“规范”的不严谨与随意性。更糟的是，作者在序中又说词表里的这些“规范词”是属于他个人的“推荐”，这又模糊了“推荐”与“规范”的分界。

当然，最严重的还是从观念上先人为主地认定某些语言要素是“不规范”的，因此忽略了马来西亚华语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及其所形成的特征。若如吴文芯（2005）所说的“华语源于普通话”、“马来西亚的华语以汉语普通话马首是瞻”等等，则必然将马来西亚华语研究带入死胡同。若是简单地把马来西亚华语中异于普通话的要素统统囫圇吞枣地标上“不规范”的标签而一概剔除，那肯定是语言研究的一大损失。因为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得以观察语言发展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我们甚至可以由此揭示更多语言演变的现象与规律。而作为沟通交际的需要而协调各地华语词汇的差异，郭熙（2002）则通过具体词汇差异类型的辨析，提出了合理而实际的解决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

如果一个词影响到双方交际，那么，这个词语就要考虑去进行协调；反之，则悉听尊便，让“语言的内部机制”去协调吧。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语言自身的生态或是从语言的研究角度，我们都应该慎言“规范化”。反之，我们应该从语言事实出发，尊重语言自身发展演变的独立性，将各地华语看成是平等的汉族共同语变体。而眼下当务之急应是对各地华语进行客观描写，即徐杰（2003[2007]）所说的：

新加坡华语的规范应该是以自身标准为依据的规范。在规范的基础上，它还应该有自身的健康发展。而这个标准的确立必须是建立在对新加坡华语本身的语言事实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至于某些人杞人忧天地认为如此将会导致各地华语的分化，终至无法沟通。徐杰（2003[2007]）也早就给出过回应，说：“答案是‘不会’！”其理由也很充分，简单的说就是现代资讯发达、交流频仍，语言在交流中只有趋同，不会分化；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文化、科技、商业、教育

交流和人员互访。文字和音像语言传输手段的发达已经大大地降低甚至消除造成那种后果的客观条件。”

论马来西亚华语研究

以上我们确立了马来西亚华语在全球华语“大家庭”中的定位及其相互关系，由此我们才能客观地看待马来西亚华语的语料，并清楚认识其语言学价值。

马来西亚华语从其历时发展以及共时形态来说，都蕴含着丰富多元的语言现象值得我们去一一挖掘。（陈保亚 2012）首先从历史来看，马来西亚华语从大陆母体中分离出来置于一个全然不同环境中发展已有上百年时间，这期间产生的差异必然很大。再从语言生态环境来说，马来西亚华语处在一个多语言、多方言的环境当中，这与大陆母体的华语也很不相同。（邱克威 2012b）

最重要的是，汉族共同语自古就是以北方方言为词汇、语音、语法基础的。而马来西亚华语却完全置身于一个南方方言，即闽粤客三大方言的语言环境中；更何况是脱离了大陆母体的。我们知道南方方言与北方方言在语言系统上彼此相通却又有较大差异的。这与大陆华语基本处在一个北方方言环境的生态是很不一样的。因此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华语在其发展过程中，以及发展至今所呈现的形态上，都表现出许多特性。这些正是马来西亚华语作为一个独立的汉族共同语变体的特殊表征。（邱克威 2013a）

对于语言研究者来说，研究自身熟悉的语言自然是会事半功倍的。然而遗憾的是目前为止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却鲜少有马来西亚学者的成果。从词汇来看，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应属郭熙（2002、2003）与汪惠迪（2009）等几篇论文，而方言则是陈晓锦（2003）的专书。马来西亚学者在此几乎交了白卷。而外地学者研究本地语言，一来语言毕竟隔一层，深层现象难以透析；再者语感毕竟不地道，语料真假不易辨析。

比如李计伟（2011）利用新马泰三地报章语料为主形成的语料库，针对“东南亚华语中特殊的‘介词 + X + 起见’格式”进行考察，举例如

“以国阵整体的利益起见”、“出于安全起见”、“因为安全起见”，提出东南亚这一句式的特殊性。然而此前许多人都曾举出过马来西亚华文报章语病的严重性（邱克威等 2011；苏金柳 2011）。而李计伟文章所举的就恰恰都是马来西亚华文报章的用例。于是我们就不得不反问：这究竟是报章的语病还是果然属于马来西亚华语的句法特色？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慎重考虑这些语料的可信性。

但回过头来看，即使有本土语感，但缺乏良好的语言学训练，也难免在材料甄别上出问题。如论者往往过于强调马来西亚语言的特殊性而不分材料性质地将方言与华语混为一谈，尤甚者乃至于将马来西亚华语与整个汉语历史发展人为割裂。（邱克威 2013c、2013d）这都是不可取的。

无论如何，客观而翔实的描写是我们眼下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以下我们就从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对马来西亚华语进行一番初步的描写，并同时展现这样的描写对于汉语研究的语言学意义。希望借此拓宽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视野，也起一个头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并参与。

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历时演变视角

关于马来西亚华语历时考察，我们首先就必须认识到马来西亚华语（其实准确地说应是南洋华人的华语）在历史发展中留下了非常大量的历史语料。这些包括 18、19 世纪以来的各种中文报章，以及本地华人或者早期传教士写下的中文著作。这些语料不仅对于我们研究马来西亚华语有帮助，甚至对于整个汉语历史发展的研究都是具有极大意义的。

（一）近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意义

庄钦永、周清海（2010）是目前利用南洋一带的汉语历史语料进行研究的最全面、最系统的专著。邱克威（2012a）曾指出：

本书以十九世纪上半叶马六甲、新加坡基督教传教士的中文译著为主要考察对象，分别以五篇专题论文，整理分析其中的汉语外

来语新词，不仅为现代汉语词汇的探源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更发掘了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材料。

而其具体贡献则是，“从现代汉语词汇探源来说，它纠正了前此学者的结论，将许多词汇的历史上推了半个多世纪。”如其“书中还附录一份‘新词新语书证年份早于《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者’431条，以及‘新词新语书证年份早于其他学者之考证者’25条。这无疑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邱克威 2012a）

比如“议会”、“宪法”等词，传统词汇学都认为是日语翻译词汇借形到汉语来的。然而庄、周书中指出了比日本文献早得多的传教士文献，如“议会”一词就是马六甲传教士米怜在1821年的文献中首次使用的。这些都是足以改写汉语词汇史的重大发现。

更难得的是，邱克威（2012a）利用书中的材料，对“火车”与“火轮车”这两个词出现的时间顺序与地域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并指出“火车”一词在文献中出现得比“火轮车”早，因此传统词汇学认为“火轮车”缩略为“火车”的提法有必要重新检讨。首先，“火机”（指蒸汽机）在马六甲文献中最早出现，当时写作“焯机”。这显然是粤方言词“火机”的转写。而较晚出现于中国文人笔下的“火轮车”显然不可能会是“火车”一词的扩展形式，因为这不符词汇发展的规律。由此可见二词是不同地域产生的词汇，即：“火车”是粤方言词汇，而“火轮车”是官话词汇。如此一来，则“火轮车”与“火轮船”二者不同的“缩略”形式就得到了更好的解释了。

以“火机”写作“焯机”这种方言音转写的词汇形式，在目前马来西亚华语中仍然存在。比如“碯石”一词，现在大街小巷仍能看见“金碯铺”与“碯石”。这其实就是“钻石”一词的闽南语发音转写。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894年的《叻报》中就已出现“金碯首饰”、“柔佛苏丹所藏之碯”，另又有1918年的社论《论采碯石》（邱克威 2013b）；这个“碯石”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与“焯机”、“火车”一样，早于目前所见文献中出现于1920年代的相应华语词汇“钻石”。

“焗机”一词的形式与“碓石”一致，都是属于方言音的转写。由此我们也可以证明“焗机”确为“火机”，而且是源于粤方言的。这是利用马来西亚华语的文献材料与现实语料的互证。这一研究揭示了现代汉语词汇形成中方言与官话二系各自发展并相互竞争的语言事实，另如“脚踏车、自行车”与“埋单、结帐”等均是如此；如果我们联系17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长期被拒于中国门外，而其对华传教据点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主要都处于闽粤方言区域的港澳南洋一带（王琛发2012），那作为与西方直接对口的闽粤方言各先形成新词新语是很自然的。这是近现代汉语新词以及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研究中所无法忽视的。

其实，马来西亚华语（或者说是马来亚华语，也包括新加坡）的文献材料中确实还有许多值得挖掘的现象。比如庄、周（2010）还提出，表日期的“礼拜X”最早出现于印尼吧达维亚华人公堂中文档中发现的《公案簿》，时间为1788/9年。这比一般公认的魏源《海国图志》早了半个多世纪。而如果我们实际考察19世纪的文献语料，更将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以《叻报》为例考察其记时词语的特点，比如“星期、礼拜”二词原先均表Sunday义，到了后期才开始转变为“星期日、礼拜日”，而今方言仍以“礼拜”指Sunday；又如表时间之“点、点钟”与“时”的交替使用，初始本地新闻表时间仅以“点、点钟”，同期转述中国新闻则用“时”，至后期本地新闻才开始使用“时”。从目前初期考察显示，上述这些词语使用的变化，以及上文提及的“碓石/钻石”和本文未详述之“巡差/警察”、“差馆/警察局”、“香枳/肥皂”等用语变化，均发生于1910年代后期至1920年代，这同时还可印证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以至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马来西亚语言生态的影响。这一语言生态变化对于新马两地华语词汇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至今仍未进行过深入探讨。

另外《叻报》中的词语如货币单位也很值得考察。《叻报》以“元、角、仙”为单位，但其“仙”是相当于华语一般说的“元、角、分”中的“分”，与马来西亚华语现今使用的“仙”不同。另外，还有“占、镛”两种货币单位。“占”即现今闽南方言仍使用的意义，而“镛”却已经不用；根据许云樵（1961）考证“镛”是粤方言区使用的货币单位。又有

“银纸、银盾”，分别指称“纸币”与“硬币”。今天马来西亚华语仍保留着源于闽南方言的“盾仔”，表示“硬币”。另如新马华语以“一元半”等表示“一元五角”之“半”，这在《叻报》中也是常见的表述法。

像这样的词汇历史发展与演变现象，如果细心搜索历史文献语料，还有许多。在此我们不一一列举。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华语词汇系统的特点，是上百年来不断积累形成的，是马来西亚华语作为一个华语变体的重要区别特征。这绝不是可以简单地以规范不规范来进行删汰或废除的。

(二) 汉语历史音变规律的意义

通过对马来西亚华语文献语料的考察，我们发现一些语音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些发现甚至可以用来印证汉语语音史上的一些演变问题，解释一些汉语语音史上疑难的特殊音变现象。以下我们略举两条：

(1) 闽南语以 k 对音 p 的问题

许云樵（1973）曾经提过南洋闽南人以舌根音[k]对译马来语唇音[p]的现象，比如“监光”译 kampung、“挂沙”译 puasa。我们发现 19 世纪的《叻报》中 kampung 一词就译作“甘公”，比如“甘公麻六甲”即 Kampung Melaka、“甘公加薄”与“甘公毛燕”即 Kampung Kapur 与 Kampung Boyan，等等。再如 20 世纪的 1917 年《二甲贪利》“监光”。这样的例子绝不是孤例，另外我们还发现吉隆坡一条街名 Jalan Pudu，原本就译作“古路街”。这些都是舌根音与双唇音对译的特殊现象。

这样的现象曾经使许云樵（1973）感到困惑，至今我们仍无法很好地解释。毕竟唇音与舌音声母之间的转移在整个语音史上都是绝少见的。然而有一点似乎是可以作为参照的，即闽语中由于后圆唇元音的关系往往会发生舌根音与双唇音的转换，比如“牛”读[gu]、[ŋu]，但也有转为[mu]的，又如“遇”也是[gu]而转为[mu]。（张屏生 2007）有趣的是，我们在马来西亚译音词中所发现的少数唇音与舌音声母之间的转移也发生在合口

呼韵母中。这至少为我们寻找声母转移的条件提供了线索，但距离解开这个深具语音史意义的谜题还很不足够。

我们仍需要搜集更多语料，才能确定其中的音变规律，并进一步探讨造成这一转移的内在机制，以解释这一不规则对译的原因。

(2) 以人声对音流音-r、-l 问题

这里要提的对音现象则是从未有人提过的，而且也恰恰可以解释汉语语音史上的一个历史公案。罗常培（1933）很早就发现汉外对音材料中有很多-r尾对译汉语入声塞音尾的现象。后来俞敏（1979[1984]）搜集了更多例子。罗常培（1933）解释为是入声塞音尾弱化为-r。后来施向东（2002）则解释为是“逆同化”的连读音变现象。尤甚者，薛才德（2002）更以中古的这一现象往上延伸，提出中古的-r韵尾来证明上古-rd复辅音韵尾的存在。

其实，这些都是引申过度，不可信的。如果我们以19世纪至20世纪初闽南语对译英语、马来语的材料来看就完全可以解释。这其实纯粹只是两种音系结构接触时，弥补彼此音系不对称性所进行的协调所导致的。我们先看看材料。以《叻报》为例，“实撈越”译 Sarawak、“巴虱”译 pasar、“巴实班穰”译 Pasir Panjang、“甘公加薄”译 Kampong Kapur、“石笼岗律”译 Serangoon Road、“雪兰岳”译 Selangor、“八仙”译 percent、“密”译 beer。再以林衡南编于1883年的《华夷通语》为例，“勿杀”译 besar、“亚逸”译 air，又“万赖”译 bandar、“吧葛”译 pagar中的“赖”与“葛”都特别注明是“入声”。

这里统统都是以入声塞音尾对译-r尾。我们知道当时的闽南语入声塞音尾是存在的，甚至到如今仍是保留，并未发生弱化为-r的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汉语族群听到英语或马来语中的流音尾音-r时，听出来音节尾部有一个舌尖发出的声音，于是对译时就使用带有塞音韵尾的入声字。这是一种弥补彼此音系结构不协调的补偿性手段。类似的例子如英语或马来语中的-s尾，闽南语都已入声塞音尾来对译，如《叻报》“武吉”、“武乞”译 Bugis，《华夷通语》“寔撈突”译 seratus、“其叭”译 kipas

等，而如今闽南人仍是称英语 office 为[o pit]。

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共时描写视角

目前为止，对于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更多的是环绕着共时系统的考察，尤其是各区域华语间词汇层面的横向异同比较。对此许多研究已经揭示了不少马来西亚华语共时系统中的特点。（如郭熙 2002；汪惠迪 2009）我们不打算重复。这里我们大略从两方面来讨论一些共时描写与研究上的特点。

（一）微观语言本体比较研究的意义

从语言系统本身来看，马来西亚华语不论是在语音、语法还是词汇上都有许多特点。这样的特点自然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的，尤其是词汇异同比较研究不少人都已经作过了；相对来说目前对于语音和语法的研究都是非常缺乏的。下面我们尝试做一些整理与分析。

首先是语音特点，马来西亚华语最明显的语音特征自然是保留了入声。这一点郭熙（2005）就曾经谈到过。比如说“得空”、“中国”、“习惯”中的“得”、“国”和“习”都读成短促调。这显然是受到方言的影响。这是客观描写马来西亚华语口语语音系统时所不能忽视的。

然而我们往往听人说“马来西亚腔的华语”，显然马来西亚华语的声调确实很有特点，但这绝不仅仅是入声问题。

其实我们发现，马来西亚华语声调的最大特点就是去声往往会倾向高平调。比如“看电影”中的“看”和“电”，以及“现在”二字都常会念成高平调，又如“效果”中的“效”也是，再如“这里”的“这”也是。这自然也是受了方言的影响。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方言，其阴平调与去声（阴调与阳调两类）的调型正好与华语相反，即：华语阴平为平调、去声为降调，广州话则阴平为降调、去声为平调。因此我们会发现香港人往往把这两个声调念混。马来西亚华语由于受到粤方言较大影响，因此也往往如此。

正是由于是受到粤方言的影响，所以这种声调特点只发生在马来西亚华语而不存在于新加坡华语口语中。这是因为新加坡华人族群以闽南方言群为主，而其华语中较少受到粤方言影响。（邱克威 2012b）

其次我们看看一些语法特点。相比于大陆普通话，马来西亚华语的语法特点不少，比如“我吃饭先”、“我有吃饭”、“我高过你”等等，这些都是讨论受南方方言影响的华语语法特点时所常提及的。我们这里只谈一个马来西亚华语中比较特殊、却又未曾有人讨论的句式，即：“X 没有”句式。

普通话中否定副词“没有”和“不”的区分已有多人从不同方面进行分析（如李瑛 1992；白荃 2000；聂仁发 2001；彭平 2002 等），较早的是吕叔湘（1980）提出二者在时间因素上的区别为“没有”“限于过去和现在，不能指将来”；“不”则没有限制。如说“我昨天没有来上课”、“我明天不来上课”，而不能说“*我明天没有来上课”。但马来西亚华语中的“没有”与“不”在时间因素上是不区分的，即“没有”也能用于指将来，如“我明天没有来上课”是常见的表达。

与此相关的，我们这里主要是谈“没有”后置的句式。

普通话“没有”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因此后置时也同样如此，如“吃了没有”、“来过没有”。而马来西亚华语中当“没有”后置时也同样不受时间因素的限制，即也是可以指将来的。比如说，吃饭时点饮料，服务员会问：“喝水没有？”意思是“要不要喝水”。不仅如此，这种“没有”后置句式的功能甚至大大拓宽了。如女生穿上新衣服，会问：“漂亮没有？”意思是“漂不漂亮”。要是我们仔细考察，这一个后置“没有”的语义及功能，其实与闽方言中的否定副词[bo]和粤方言中的否定副词[mou]完全一样。因此显然就是受到了方言影响所致的。

与此相类似的马来西亚华语中，虚词受方言影响而产生的特殊句式还有一些。比如杨迎楹（2012）也指出马来西亚华语中受闽语影响而产生的“湿到完”、“热到叫人顶不顺”等句式，即由闽语的“遘”使得华语中“到”具备了动结式结构之间连接动词与补语的功能。

至于词汇方面，比较异同的研究自然是目前做得最多的。然而诚如陆

俭明(2002)很早就提出的,区域华语研究必须注意区分“方言与华语;口语与书面语”,才能严格界定“华语研究”的范围。眼下事实确实是多数研究都不进行范围界定,也不辨析语料性质,比如《全球华语词典》(李宇明主编2010)所收马新“枋廊”、香港“识 do”等,不论从词汇音读或是语用层面上,都是方言口语词汇。在这方面《全球华语词典》在收词标准上显得过于随意性。也正因此才造成了词典编纂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即“用方言字书写和由外语引进的华语词语,如何注音拼写”。(高家莺等2011)其实这一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方言成分与华语成分的辨析与区分。

当然区域华语词汇的“方言/华语、口语/书面语”的区分往往相当复杂,如邱克威(2013b)曾以马来西亚华语词汇例子说明其“方/华、口/书”之间复杂多样的关系。但问题仍是要解决的。邱克威(2013a)曾广泛搜集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的方言词汇,并按其音读变异分为三种类型:

- 一、“语码转读”,即完全转换为华语的对应语素。如“搵食”转为“找吃”;“畀面”转为“给脸”。
- 二、“语码混读”,即完全按照原方言字音。如“枋廊”仍读[bɑŋ loŋ];“三牲”仍读[sam seŋ]。
- 三、“语码变读”,即按原字变读为华语字音。如“够力”、“好彩”都已转读为华语字音。

并将其置入方言词进入华语的历时过程,即语码转换到语言混合的历史发展序列中,进行解释。据此我们可以通过音读问题的处理,制定判断方言与华语“混合”程度的标准,从而解决词典的收词标准及方言借词的注音问题。

正是马来西亚华语所处的特殊环境,即多方言并存、并用,也就是陈保亚(2012)所提的“多向度等势接触”,这一长期积淀下来的丰富语言生态,为我们保存下来如此多样的变异形态,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一共时系统内看到这一接触过程中由“语码转换”至“语言混合”序列内多个层面的表现形式。

(二) 宏观语言社会调查研究的意义

马来西亚是个多语言、多方言的环境，因此造成了其特殊的语言生态。华语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外语及方言的影响，自然会形成许多特殊现象。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语言是依附于其所存在的社会的，社会形态的不同必然形成语言的差异。新加坡虽然也是多语言环境，其与马来西亚的地缘、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紧密联系，很容易让人将两地的华语混为一谈。正如汪惠迪（2011）所一再说的：“新马两国一衣带水”。但这并不完全准确。而且也正是如此简单化的处理，才导致《全球华语词典》中有多处错将新加坡华语词汇说成了是“新马词汇”，而更严重的是许多马来西亚特有的词汇却并未收录。对此颜殖为等（2012）曾经进行过系统的整理与分析。

对于新马两地华语词汇的特点，重点是需要仔细考察与辨析两地之间的词汇异同及其差异的形成原因。邱克威（2012b）即通过对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社会环境进行深入的分析，提出四点差异：外语影响因素的差异、方言影响因素的差异、外地华语影响的差异、语言规划因素差异。而这四点社会环境差异就直接导致两地华语词汇系统的不同。

另一方面，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华语的多方言环境是非常有特点的。这就为社会语言接触与竞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尤其难得的是，马来西亚华人聚落基本保持着先民南来时的社会状态，即方言群聚居的形态。因此形成了村落式的方言聚落。此外，较大的区域来说又形成一种强势方言，如中马一带粤方言是强势方言，甚至可以与华语平分天下的；而南马及槟城地区闽南语则最强势。于是，要是加上共同语华语，马来西亚华人社群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族群方言、地域方言、民族共同语三者相互竞争、相互混合的态势。对此陈保亚（2012）很准确地总结为华语的“多向度等势接触”。这在社会语言研究来说是个非常好的调查对象。

目前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用语的调查研究是做得相对较多的，已经发表的成果如王晓梅（2006、2007）、洪丽芬（2008）、许丽珊、赵亮（2011）等。这些研究都特别关注马来西亚的华语方言生态问题。诚然这

是非常值得仔细调查与研究的。只是目前的工作都是零星而个别的，还未出现针对某个地域或者某个方言的系统而全面的调查研究成果。

笔者自 2011 年开始指导博特拉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进行比较有系统的雪隆及周边地区客家聚落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与研究，后来又结合词汇调查，从语言使用和词汇掌握两方面来了解目前客家方言的保存与使用情况。比如黎卓蓉（2012）针对吉隆坡以南的沙登新村（Serdang）所作的社会语言调查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种族群方言、地域方言、民族共同语之间的相互竞争情况。沙登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新村，这是一个客家聚落，新村人口三万多人；但它处于中马地区，同时又是在粤方言的势力范围内。因此调查结果显示，客、粤、华之间除了表现出此消彼长的替代过程外，而且在语言功能上也显示出明显分工。首先，客家话在地域方言和汉语的合攻下渐渐退守为局限于家庭用语；至于公共场合用语，则随着年龄层趋小，从粤、客并用转变为粤、华并用，再降至 35 岁以下者以汉语为主、粤语为辅，又至于 15 岁以下者的纯用汉语。这种客、粤、华“相互竞争与共存，三言互相交叉使用与职能上的分工等现象”（黎卓蓉 2012），在吉隆坡以北增江新村（Jinjiang）北区的客家人聚落中也同样表现出来。（叶碧玲 2013）有趣的是，增江新村的客家聚落是处于闽南族群包围下的，但闽南语却丝毫没有对其产生影响，反而是更大区域的粤方言对其语言生态产生了作用。再反观在森美兰州芙蓉（Seremban）附近的小甘密新村（Kampung Baru Sikamat）里的“客家村”，情况又有所不同。这是处于粤方言强势区域的边缘地带，但这个“客家村”是与同处一个新村内的“广东村”均势的，只是调查却显示这里的客家族群并未受粤方言所侵蚀。不论是从词汇调查或是语言使用调查来看，该客家聚落都较完整地保留着客家话的语言生态。（郑美玉 2013）

由以上几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马来西亚社会语言的多元性所带来的语言生态变化的多样性，其中语言内外因素对于各自消长的影响机制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像这样的语音并存以及竞争的现象考察，将向我们揭示更多语言生态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如果我们将研究延伸至语言本体的调查上，必然揭示更多关于语言接触方面的有趣现象。这是非常值

得我们去关注的课题。这样的现象及其研究成果，将会对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接触模式方面的发展与研究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参考案例。

结语

以上是我根据个人考察与分析所得，针对“华语”的定位以及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发展提出一点浅见。其中提到的一些现象，许多仍处于初步观察阶段，希望借此展开讨论，借一句郭熙（2005）在一篇讨论马来西亚华语的文章中的话：“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这方面的课题。”

最后需要重申，作为掌握马来西亚华语第一手资料的马来西亚语言研究工作者，我们自己就得先将马来西亚华语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看待，即将其置于整个汉语历时发展与共时变异的大环境中进行审视，纵向看其历史变化、横向看其地域差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其进行客观描写，揭示其深厚丰富的文化、社会、历史、语言等方面的内涵。而本文所讨论的，只是这丰富内涵中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题材及其语言学价值等待我们继续挖掘。想要实现郭熙（2005）所呼吁的“更多的人关注”，我们首先就得自己先行耕耘。这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 白荃 2000。《“不”、“没（有）”教学和研究上的误区——关于“不”、“没（有）”的意义和用法的探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页21-25。
- 陈保亚 2012。《马来西亚多语现象：一种独特的接触类型》，载《当代评论》第3期，页61-69。
- 陈重瑜 1986。《“华语”——华人的共同语》，载《语文建设通讯》第21期，页7-9。
- 陈晓锦 2003。《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方维规 2012。《“夷”、“洋”、“西”、“外”及其相关观念：晚清译词从“夷人”到“外国人”的转换》，载《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页97-127，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 高家骞、颜逸明、范可育、费锦昌 2011。《〈全球华语词典〉四人谈》，载《语文建设

- 通讯》第 98 期，页 1-6。
- 郭熙 2002。〈普通话词汇和新马华语词汇的协调与规范问题——兼论域内外汉语词汇协调的原则和方法〉，载《南京社会科学》第 12 期，页 79-84。
- ____ 2003。〈马来西亚檳城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载《中国社会语言学》第 1 期，页 113-120。
- ____ 2004。〈论“华语”〉，载《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 2 期，页 56-65。
- ____ 2005。〈马来西亚：多语言多文化背景下官方语言的推行与华语的拼争〉，载《暨南学报》第 3 期，页 89-96。
- ____ 2007a。〈现代华人社会中称说“汉语”方式多样性的再考察〉，载《南开语言学刊》第 1 期，页 7-13。
- ____ 2007b。〈以“国、中、汉、华、唐”为上字的词与社会认同建构〉，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页 83-90。
- 洪丽芬 2008。〈马来西亚两代华裔的父子用语比较〉，载《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 11 期，页 47-57。
- 金基石 2003。《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 李计伟 2011。〈东南亚华语中的“介词+X+起见”格式〉，载《语文建设通讯》第 98 期，页 19-22。
- 李瑛 1992。〈“不”的否定意义〉，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页 61-70。
- 李宇明主编 2010。《全球化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黎卓蓉 2012。〈雪兰莪沙登新村华人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载《学文》第 2 期，页 118-127。
- 卢戇章 1892[1957]。《一目了然初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年重印。
- 陆俭明 1995。〈关于新加坡华语规范化问题〉，新加坡：《联合早报》6 月 16 日。
- ____ 2002。〈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载《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页 75-148，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 陆俭明 2005。〈关于建立“大华语”概念的建议〉，《汉语教学学刊》第 1 期，页 1-4。
- 卢绍昌 1982。〈华语与方言〉。载《华语论集》页 43-51。新加坡：金昌印务。
- 罗常培 1933。《唐五代西北方音》，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吕叔湘 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聂仁发 2001。〈试论否定词“不”与“没有”的语义特征〉，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 1 期，页 84-88。
- 彭平 2002。〈亦谈“不”和“没有”〉，载《成都师专学报》第 21 卷第 1 期，页 82-85。
- 邱克威、余秀琪、王慧琳 2011。〈马来西亚三大中文报章的语法错误分析〉页 30-39，载《汉语语言学研究新趋势与科学实践》，吉隆坡：Cemerlang Publications Sdn Bhd。

- 邱克威 2011a。〈谈谈马来西亚华语规范化〉, 马来西亚: 《东方日报》10月9、10日。
- ____ 2011b。〈再谈马来西亚华语规范化〉, 马来西亚: 《东方日报》10月25、26日。
- ____ 2012a。〈评《基督教传教士与近现代汉语新词》〉, 载《语文建设通讯》第100期, 页62-66。
- ____ 2012b。〈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语词汇差异及其环境因素〉, 载《中国社会语言学》第2期, 页96-111。
- ____ 2013a。〈马来西亚华语中的方言词音读变异——多方言社会中语码转换与语言混合的现象考察〉, 载《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论文集》页349-376,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 ____ 2013b。〈店铺招牌中的马来西亚华语词汇〉, 载《语文建设通讯》第102期, 页47-55。
- ____ 2013c。〈一份语言洁癖者的供词——写在重谈马来西亚华语规范化之前〉, 马来西亚: 《东方日报》4月13日。
- ____ 2013d。〈柏拉图与无毛鸡〉, 马来西亚: 《东方日报》4月27日。
- ____ 2013e。〈“大华语”形势下之区域词汇协调 - 评议马来西亚“舞狮”与“狮子舞”之争〉, 载《语文建设通讯》第103期, 页49-56。
- 施向东 2002。〈梵汉对音与古汉语的语流音变问题〉, 载《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页44-51。
- 苏金柳 2011。〈中文报章的语误现象〉, 载《汉语语言学研究新趋势与科学实践》页40-51, 吉隆坡: Cemerlang Publications Sdn Bhd。
- 苏新春 2002。〈论异形词规范的俗成性、实用性及指导性原则——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草案)》〉, 载《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 页25-32。
- 王琛发 2012。〈以拉丁表音学习汉学及传播西学的先行者——天主教亚洲总修院17世纪以来对汉语地区的宗教教育与文化交流〉, 载《中国之为中国: 正统与异端之辩》, 页245-265,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汪惠迪 1984。〈新加坡华语, 走自己的路! ——读卢绍昌先生《华语论集》〉。载《语文建设通讯》第16期, 页19-25。
- ____ 2009。〈马来西亚华语规范方略〉, 马来亚大学2009年华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 ____ 2011。〈让《全球华语词典》在中华文化遗产中永生〉, 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11月1日。
- 王晓梅 2006。〈马来西亚华语与方言的竞争〉, 载《国家疆域与文化图像2: 汉语文走向世界》页163-183, 新加坡: 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 ____ 2007。〈柔佛州三代同堂华人家庭的语言转用〉, 载《敲开语言的窗口——多样性、变异性和规范性》页142-155, 马来西亚: 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学院。
- 吴文芯 2005。〈马来西亚华语口语的语音特点〉, 第38届国际汉藏语会议论文提要。

- 徐杰 2003[2007]。〈宽式国际华语大家庭的一员——新加坡华语的定位与规范〉, 载《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页 33-47, 学林出版社 2007 年。
- 许丽珊、赵亮 2011。〈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青少年语码转换之社会表现研究〉, 《南洋问题研究》第 1 期, 页 65-76。
- 许云樵 1961。〈“角子”“镗”和“王”的来历〉, 载《马来亚丛谈》页 40-43, 新加坡: 青年书局出版社。
- ____ 1973。〈华巫通语〉, 载《文心雕虫》页 86-87, 新加坡: 东南亚研究所。
- 薛才德 2002。〈藏文 *-r、*-l 韵尾与上古汉语若干韵尾的对应——兼论前上古汉语的复辅音韵尾〉, 载《上海大学学报》第 5 期, 页 60-65。
- 颜殖为、叶楚原、郑萃苇〈评论《全球华语词典中的马来西亚华语词条》〉, 载《学文》第 1 期, 页 90-97。
- 杨欣儒 2010。《部首、笔顺与规范词语》, 联营出版社。
- 杨迎楹 2012。〈“遘”、“甲”——“到”的方言华语化〉, 马来亚大学 2012 年华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 叶碧玲 2013。《增江新村北区客家人的方言掌握情况调查研究》(未刊),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学士论文。
- 俞敏 1979[1984]。〈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 载《中国语文学论文选》页 1-30, 东京光生馆 1984 年。
- 张从兴 2003。〈华人、华语的定义问题〉, 载《语文建设通讯》第 74 期, 页 19-25。
- 张屏生 2007。《台湾地区汉语方言的语音和词汇》, 开朗杂志事业有限公司。
- 郑美玉 2013。《芙蓉客家村的语用生态研究》(未刊),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学士论文。
- 周清海、庄钦永 2010。《基督教传教士与近现代汉语新词》, 新加坡: 青年书局出版社。
- 周清海 2011。《人生记忆——一个华文教学者的回忆》, 新加坡: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 邹嘉彦、游汝杰 2001。《汉语与华人社会》,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